

兩岸關係中的兩種論述風格 之分析

石之瑜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摘 要

兩岸在關於彼此關係的論述上，可以分成三塊：一、在關係論述中統與獨的衝突；二、在現實論述中能力、價值等方面的衝突；三、論述風格差異引起的衝突。過去認為兩岸在認知上有衝突，指的是同一類論述風格之內的衝突。本文則認為，因為論述風格不同所引起在認知上的衝突，其在情感上所造成不安，未必亞於統與獨之間的衝突。台北的優勢是可以熟練地轉移論述的風格，這在短期內有助於分散因為關係論述中的尖銳對立所引起的衝突，但長期下來因而累積了在北京方面的極度不安。此時台北的優勢就可能轉變成負債，因為在台北，人們不理解為什麼大陸的人不能在論述風格上像台北一樣有彈性，這種不理解，使北京更難釋懷，為什麼台北可以週期地放下在應然或態度問題上的討論，突然變成一個分析家對大陸指指點點？

關鍵字：兩岸關係，論述，大陸政策，對台政策，知識論，中國研究

* * *

一、前言：問題的提出

一九九九年四月，在台北圓山飯店的一個關於中共改革二十年的國際研討會上，大陸赴美留學後在新加坡任教的鄭永年教授，提出以漸進主義來形容中共對政治改革的態度^①，這個說法引起了許多批評，因為他對漸進主義沒有定義，幾乎所有官方的政策都可以視為漸進主義，至於什麼不是漸進主義，他也沒有舉例，而漸進的政治改革與儘量迴避任何政治改革兩者之間，似乎他並不願意做區分。在被問及是否知道中

註① Yongnian Cheng, "Political Incrementalism: Political Lessons from China's Twenty Years of Reform,"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PRC Reform at 20: Retrospects and Prospects (Taipei, April 8~9, 1999).



共領導對於民主化的立場時，鄭教授表示他相信中共官方仍是以漸進的方式，在推動民主化。很顯然，鄭教授的說法在受過嚴格科學訓練的聽眾耳中，很難引起共鳴，不是他說得不對，而是不知道如何判斷他說得對不對。有趣的是，他本人似乎絲毫不覺得被挑戰了，甚至對於會場的某些提問人，他連回答的興趣都沒有。

再把時光回推到一九九〇年九月的舊金山，時逢大陸留美學人趙全勝針對中共的外交政策，提出一個「彈性的僵化」概念做分析工具^②，基本上就是，當碰到原則性問題時，北京的政策立場必然是僵化的，只要原則問題解決，中共外交就會表現出極大的彈性。與會者請他說明如何判斷什麼是原則問題時，他建議人們去實際觀察中共的決策，從決策僵化與否就可以判斷出，是否有原則問題涉及其中。趙的解釋引起一些交頭接耳，顯然他用了邏輯上的循環論證，這在一般社會科學家的理解中是不能接受的。但是趙教授本人並未察覺聽眾間的不安，在聽眾中有人追問時，耐心聽取意見的他，顯然對於聽眾的困惑不能體會。

鄭教授與趙教授是尖端的學術菁英，對於像循環論證這樣的邏輯謬誤一定都能掌握，但何以落實在自己討論的課題中時，會渾然不知呢？唯一合理的解釋，便是在他們的眼中，他們並沒有犯循環論證的謬誤，甚至他們並沒有察覺，聽眾對他們的質疑是關於循環論證方面的，不然應當引起不安，因為這是最不該的基礎科學常識錯誤。那麼，是什麼樣的因素讓他們和聽眾之間，起了溝通上的誤會呢？難道是聽眾群一廂情願，將漸進主義與彈性的僵化放錯了知識論的位置，才會硬把定義的問題和操作的問題混為一談。換言之，當漸進主義和原則問題這兩個概念不涉及客觀定義時，兩位教授就沒有犯循環論證這樣的錯了。

假如漸進主義和原則問題非關定義，自然也就不能和具體的政策行為之間進行相關性分析，那就不能用科學來解釋這些政策行爲了。那麼兩位教授是在解釋什麼呢？這就涉及到什麼叫做科學解釋的知識論問題。照說社會科學家的任務，是要發現決定政策行爲的普遍性因素，所謂普遍性就是不會因人、因國、因文化而異，故凡是不能客觀定義的概念，不屬於社會科學解釋的範圍。這種知識論預設了人的理性，即在相同因素的制約下，人皆會有一樣的反應，否則就會達不到他們的政策目標。最多，人們因為認知能力不同，必須經歷長短不同的嘗試錯誤學習過程。兩位教授既然認為自己也在解釋政策行爲，則多半在他們的知識論中，並不存在一般社會科學研究中那種理性的預設，也沒有放諸四海皆準的普遍性因素。於是乎，人的重要性就凸出了，如此一來，政策情境中任何一個因素，只具有因人而異的相對意義，而非絕對的意義。

在這種知識論之下的解釋，重點不僅在於人們為什麼做了他們做的事，而更在於人們排除了什麼他們原本可以做卻沒有做的事，意志力的作用在這裡凸出了。也就是說，理性的思惟並不能具體的指導人的行爲，因為所有的制約都是相對的，在不同的意志之下，這些制約傳達出不同的意義。假如人們看到，所謂漸進主義或原則問題是

註② Quansheng Zhao, "Achieving Maximum Advantage: Rigidity and Flexibility i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presented at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annual meeting (San Francisco, September 1, 1990).



一種意志力的表現時，就會預期，這時對行為的解釋必然同時是一次評價，能用漸進主義或原則問題解釋得通的政策，就是對的政策，否則便是錯的政策。其實漸進主義也就是一種原則，而原則問題簡單說無非就是一種應有的態度，故又帶著規範的性質^③。所以鄭教授講的漸進主義，是他所歸納發現中共領導人心中的一種處事態度，當然說不準具體情境中會是什麼政策。甚至，這樣的態度會促成不同情境下迥異的政策選擇，外界一旦將漸進主義用特定的政策行為來界定，就無異是否定了態度的重要性。

鄭教授與趙教授的困境在於，他們想藉由在社會科學研討會上，以社會科學學術格式，來表達他們看到的中共領導人的態度，引起了聽眾關於行為理性的期待。當聽眾在理性客觀的分析邏輯中遭逢循環論證，卻又無法有效溝通時，當然感到不安，甚至有表現輕蔑者；而相對的，兩位教授的看法無法有效傳達，也產生了異化的效果，選擇不對話或不回答也就不足為怪。試想，倘若處在這兩種完全不同論述方式中的人，不是學者而是決策者的時候，他們造成彼此在認知上的誤解，與隨之而發生在情感上的相互排斥，便會影響到資源配置的方向。本文以下就要討論，當這兩種論述同時出現在兩岸關係中時，會造成什麼影響。

二、兩種論述風格

鄭、趙兩位教授所表現的，其實是一般社會科學討論中，比較少用的一種論述風格，所謂論述風格，指的是我們在討論問題時，是站在誰的角度，解決什麼困惑，而且怎麼樣才算是回答了問題。對於兩位教授而言，他們所分析的決策者的態度對不對，是最關鍵的問題，因此必須先找出決策者的態度。在作法上，便是去觀察決策者的行為能否被這個應然的態度解釋。對一般社會科學家而言，態度應當是被解釋的對象，起碼也是介於自變數與應變數之間的中間變數。但在兩位教授的論述風格中，態度是用來解釋行為的。

論述風格的不同，造成人們對彼此所表達的看法不能真正體會^④，甚至以為他方在推論上出了問題而加以輕視，或相信對手是傳達了一種迥異的立場而感緊張憤慨。論述風格的種類繁多，可以依照宗教、意識形態、教育、職業、家庭、性別、年齡等等無窮盡的因素加以分類，本文以下則就兩岸關係當中，歸納出兩種看似正在起主導作用的論述風格，姑且稱之為現實論述與關係論述。所謂論述風格，不等同於論述的內容，故同一論述風格中的敘事主體，仍可以因為意見相左而你死我活，二十世紀末常見的例子就是因原教主義而爆發的民族、宗教衝突。在這一類衝突中，衝突的各方對於彼此所提出的動員口號，都能準確地理解，衝突所製造的不安，是因為人身安全受到彼此威脅之故。

相對於此，因為論述風格的不同所帶來的不安，不是對人身安全的威脅。人身財產的不安全感之所以發生，必須是自己能確認到威脅的來源，並對威脅的強弱加以研

註③ 石之瑜，*民族主義外交的困境*（台北：世界出版社，民國八十四年），頁六一～九一。

註④ 參見 Paul Dies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he Policy Sciences* (New York: Aldine, 1982).



判。故人身不安全的發生，是在既有的世界觀中為人加以理解，這種因為威脅明確所帶來的不安，反而有強化既有世界觀的作用。但倘若溝通的雙方是處在不同的論述風格中，不安的產生就非指對人身財產的威脅，而是指對世界認識的方法迥異所致^⑤，受到挑戰者不是人身財產的本身，而是人身財產的意義。這個意義是人們保衛人身財產的原初動機來源，當意義發生動搖時，人們的不安不在於受到強大的具體威脅，而是不知道如何理解威脅的概念，從而喪失自我保護的動機，故又可視為是一種因為空虛所帶來的不安，要平撫這種不安，往往促使人們想找到具體的代罪羔羊。

論述風格的不同，可以從人們問的問題性質不同看出來。人們問一個問題時，往往透露出所要解決的困惑，或要澄清的疑點為何。由於疑點的性質不一樣，則論述所採用的推理方法也各具特色，用來做判斷時所依據的參考指標，就自成體系。對於敘事者而言，不同論述風格意味著人們進行論述的意義是不同的，有的人在敘事時的前提，是自己必先置身事外，而其它人在敘事時首先要確認的，就是自己的立場獲得明確無誤地表達。可見，不同的論述風格可以反映出敘事者參與論述的動機：在那種假設自己置身事外的論述風格中，人們得減少那些會刺激情緒的辭彙，否則聽眾不會容許敘事者一塵不染地置身事外；而假設自己介入至深的敘事者，就不能太過於冷漠平淡，要不然怎樣澄清態度。所謂動機，當然就是指敘事者所預設的自己和聽眾的關係應當為何。

從關於鄭、趙兩位教授的漸進主義和原則問題討論中，可以區分出兩種論述風格，在問題意識、論述對象、論述功能、論述方法、論述動機、參考指標和時空位置等面向上的差異，表示如下：

表一 兩種論述風格比較

指 標 \ 類 別	關係論述	現實論述
問題意識	應然態度	實然分析
論述對象	政策立場	行為理性
論述功能	說明主張	建立通則
論述方法	歷史歸納	邏輯推演
論述速度	印象自發	記憶搜尋
參考依據	人我關係	現實利害
論述動機	情感評價	認知建構
時間位置	事後澄清	事前預測
空間位置	特定情境	普遍適用

註⑤ 關於世界觀中的陌生人如何相處，參考 Naeem Inayatullah and David Blaney, "Knowing Encounters: Beyond Parochial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Y. Lapid and F. Kratochwil (eds.), *The Return of Culture and Identity in IR Theory* (Boulder: Lynne Rienner, 1996), pp. 65~84.



關係論述的風格以確定對與錯的應然問題為出發的問題意識，因此論述的焦點放在當事人的意圖上。敘事者和當事人可以合一，這是在政府發言位置者的優勢^⑥，但在學術環境中這兩個角色往往是分開的。在關係論述下的學術界敘事者，其任務是協助讀者進入當事人的情境，體會當事人的意圖，並從這個意圖來解讀事件的意義，所以敘事的本身具有闡述政策的作用。這裡所需要的分析，不是客觀環境制約下造成行為不得不然的分析，而是何以客觀環境的制約，並沒有改變當事人應有的態度和立場。故在關係論述中，很重視當事人的意志力，關於這個意志力的描寫，也就同時具有政策宣傳的功能，因為敘事者必須藉由當事人某些言行中的蛛絲馬跡，向讀者證明何以當事人的意圖並未改變。

所以，關係論述的前提，是從當事人長遠以來的表現出發，根據過去的表現所累積了的印象，可以很快地賦予當前政策以意義，其中經歷的知覺過程相對快速，有時對一個政策的評價幾乎是自發的，因為敘事者十分熟悉研究對象的本質為何，此早經歷史經驗歸納所知。這是何以一般關係論述會傾向於鞏固既有的社會關係，在這種論述風格中一個當事人的形象轉變是漸進的，不是斷裂的，而對當事人迅速的正負面評價依據為何，常常要在評價已定之後，才慢慢地細說從頭^⑦，此何以指關係論述受到強烈的情感動機所趨動，並對當事人的正反評價如此重視。論述中一項關鍵的參考依據，就是敘事者與當事人的關係定位，或當敘事者假定自己已經神入當事人所處之情境後，當事人／敘事者和他（她）的政策對象間的關係定位。故敘事者對自己的態度認真處理，但對於環境的制約卻必須有所忽略或貶抑。

關係論述風格不以跨時空的普世模型為號召，敘事者的重點在於評價當事人，因而必須從當事人所受到的環境壓力中體會彼之處境，這個評價必然是事後的，或起碼得起一個提醒的作用，讓當事人了解自己爾後受到評價時所依據的應然準則為何。敘事者可以根據這個應然的立場，判斷當事人的態度正確與否，從而解釋了當事人的行為，即彼之態度是否能夠堅持，對政策能否貫徹，意志夠不夠強。由此可知，這種解釋是極端情境取向的，只有在具體情境中才能對當事人的態度給予公平的評價，所以關係風格的論述要先整理出，當事人在特定時空的政策過程中，曾經受到什麼具體社會關係的左右，而評價的正負也會依照敘事者自己所處歷史時空而改變頻繁，則對歷史事件的正確解釋將隨此時空而轉移。

現實論述風格在出發點的問題意識是人的需要，咸信在同一系統中之人有共同的幾種需要，這些需要是不可逃避的現實，所以分析家作的不是應然的分析，而是實然的分析。分析家關心的問題，在於人如何為了更好地滿足自己的需要^⑧，從而對自己

註⑥ 參考 Chih-yu Shih, "The Drama of Chinese Diplomatic Spokesmanship," *The China Quarterly* (Soeul) 13 (Summer 1991): pp. 1~39.

註⑦ 參見 Milton Lodge and Patrick Stroh, "Inside the Mental Voting Booth: An Impression-Driven Process Model," in S. Iyengar and W. J. McGuire (eds.), *Explorations in Political Psycholog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225~263.

註⑧ 例見 Brian Barry and Russell Hardin (eds.), *Rational Man and Irrational Society? An Introduction and Source Book* (Beverly Hills: Sage, 1982).



手邊的資源、環境的制約加以比較，並選擇一條對自己最有利的途徑。因此人如何從環境中獲得資訊，如何經由學習簡化決策成本，甚至轉移目標，都成為論述時針對的對象。所謂目標，在此不具有絕對性，只具有相對性，人的需要滿足與否是程度問題，不是對錯問題，因此人就有了理性的特質，這個特質不因爲分析家的分析而改變，故分析家的功能只可能是作爲一名外在的觀察者。好的分析家提供一個嚴謹的模型，一方面可供後人用更新更多的例子來檢驗是否正確，另一方面提供後來者決策的方便。可見，在現實風格中，分析家假設自己是沒有自我的，任何分析都要先經過蒐證和推論的認知過程。

既然現實風格的論述假定事實不受分析家好惡的影響，其最大的成就正是模型的建構，則人的多樣行爲可以因爲獲得簡化而得到更好的因果觀察。不可避免地，模型的出現是反映了特定的關於人的需要的假設，這些假設就形成某種價值體系，它的目的不是像關係論述要區隔人與人之間的差序格局，而是要強調不同的人之間享有共通性。由於模型與價值皆是繁複的心智活動產物，因此分析家不可能在一個事件或行爲發生的刹那，立即得出論述所需的完整邏輯，而必須經過與記憶中的模型或價值比對之後，才提出關於政策意義的分析^⑨，故情緒的作用是隱約、間接的，應當迴避的。分析家更要提出有物質基礎的現實利益資料作爲推論依據，則人的意志力就無關緊要了，其人的態度與立場是應當被解釋的對象，不是用來解釋行爲的角度，故不存在對錯評價的任務，對與錯的問題，只有當事人違反模型與價值的規定時才存在，而這些違反仍然得靠用模型才能更完整的加以解釋。

現實風格的論述不需要等到行爲的發生才做解釋，不但在行爲發生之前就已經決定是什麼因素在決定一個行爲選擇，甚至還對未來的行爲可以預期。在關係論述中對行爲的預期是出自對當事人的認識，在現實論述中則是出自對環境制約與人的需要的規定，所以後者是跨越時空，具有普遍適用性的論述。也因爲如此，現實論述是可以用來說明政策爲什麼發生，不是說明政策爲什麼正當。當分析家與決策者合一的時候，決策的正當性是來自分析上的不得不然，故是一種理性的表現，而不是來自於不畏橫逆，或一種意志的表現。

在關係風格中的敘事者，每當聆聽一項現實風格的分析時，都必須花很大的心力，去釐清其中到底是什麼政治態度。有兩項因素幫助關係敘事者來替現實分析家定位，首先是此人分析的結論符不符合應有的態度，其次是此人過去分析的結論，符不符合當時應有的態度。於是，對於分析家的歷史表現與社會關係的脈絡加以分析，就變成是關係敘事者的對話起點。這兩個因素不清楚的時候，就引起不安，不是因爲被威脅感到不安，而是因爲人我關係不穩導致的不安。此外，敘事者與分析家正面對話，常使得敘事者認爲，自己展現意志力的政策態度，淪爲一種現實的利益考量，致對話的本身否定了敘事者關於對與錯的關懷，也就挑戰了敘事者所處的位置，使得他（她）

註⑨ 參見 Eugene J. Meehan, *Explanation in Social Science: A System Paradigm* (Homewood, Ill.: The Dorsey Press, 1968).



無以回答分析家的模型或價值預設。

在現實分析家解讀關係論述時，難免希望找到此一論述所反映的現實利害結構，碰到關於態度與立場的談話時，都想要分析出具體的指涉為何。由於關係敘述者是依情境在論述，因此提不出什麼普遍性的結構邏輯，從而有令人難以捉摸的印象，這當中反映出的一個困擾，就是理性不足，而理性是現實論述中核心的論述對象，假如關係論述給人的感覺，是超越了理性模型與價值的範疇，當然就成爲一種無法解釋的行爲，因爲不承認理性所造成的分析家的恐懼，不是具體的恐懼，而是失去準則的莫名的恐懼，尤其當關係論述的敘事者將理性、現實看成是錯誤的態度時，否定了分析家論述的位置。現實論述此刻的典型回應，是先看關係論述的敘事者有多大的能力與資源，再來判斷其人的看似不理性對自己到底是虛張聲勢或步步爲營。

三、北京與華盛頓的兩岸論述

自從一九九五年與九六年的台海導彈危機以來，台灣問題是北京與華盛頓的主要議題，而雙方在論述上展現截然不同的風格顯而易見。北京的一個中國原則是一個應然而不是實然的主張，這點連北京自己也知道^⑩，因此重點不是中國現實狀態要如何表達，而是一個中國的正常狀態要如何恢復。中共的談判代表最爲關切的是，台北在態度上願不願意接受中國統一的方向。在海協會與海基會兩會談判的過程中，北京強調的是兩岸往統一的方向發展，對台北強調的法律管轄權問題，海協會提出了一個態度問題，即不應該用文字將兩岸分裂的現狀固定下來。這個態度後來在海協會方面被普遍認爲是妥協的一項談話中，再度展現，根據這個談話，中國的統一是「現在進行式」^⑪。

海協會的每一次發言，都是在宣傳強化一個中國的原則，對於什麼是一個中國，卻可以同意爭論。照海協會自一九九二年以來一貫的說法，兩岸對於一個中國的解釋可以不同，即令如此，仍然認爲台北只要回到一個中國的立場上就可以了，換言之，一個中國這樣的一個態度問題，完全和此一態度所指涉的具體安排爲何脫鉤。大陸一般學者討論到兩岸關係時，沒有例外地都在表達反對分裂的立場，這些學術分析的出發點，幾乎無不集中在台北政壇對於統一的態度上，故分析本身就是在說明或執行政策^⑫。他們顯然對於具體的政策會有不同看法，可是這些不同看法有個反分裂的前提則完全一致，都是不斷地將台北放在一個中國的態度上檢視，所以均對於北京政策的推動有助益。

海協會的論述對於兩岸相對關係極度重視，這表現在它對名稱問題的絕對敏感^⑬。

註⑩ 故一個中國或一國兩制的方針，從一開始就是用來促進統一的，例見姜殿銘（編），台灣一九九一（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一九九二年），頁四一五～四四〇。

註⑪ 參見邵宗海，「兩岸重塑事務協商與初探政治談判」，中共研究三二，三～四（民國八十七年三～四月），頁八八～一〇三，頁八六～九八。

註⑫ 有關事例不勝枚舉，比如，李家泉，「一國兩制」與台灣前途（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一九九一年）。

註⑬ 這種名分論爭是關係論述的特點，參見張啓雄，「民初中俄蒙恰克圖會議的名分論爭與交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二四（上）（民國八十四年六月），頁三二五～三六四。



不僅海協會如此，凡是在國際場合兩岸各有參與的時候，不論這個場合是官方的或民間的，大陸出來的團體都不能接受中華民國的稱謂。極端的例子像紐西蘭在九九九年舉行亞太經合會議的部長級會議，台北的代表是主管經濟方面的政務委員，而不是經濟部或經建會的官員，結果北京的代表認為這裡有將台北從經濟體提升為政治體的作用，因此退席抗議。顯然，從北京敘事者的角度來看，兩岸在國際上的相對關係，比雙方實際利害的交流合作更重要。它沒有一個分析的模型來解釋台北派出政務委員的原因，或即使有這樣的模型，也沒有一種政治上能接受的論述來溝通，故只能用態度上是否有利於一個中國的原則，來解釋台北的動機。

上述這種解釋上的看似簡化，其實反映出北京根本不是對台北的行為在分析，而是已經根據過去幾年與台北互動的經驗，歸納出台北意圖鞏固兩岸分裂現狀的結論^⑭，因此台北每一次的行為都可以不花時間地立刻解讀成在追求政治獨立地位，故分析的過程近乎自發，重視行為的效果而非客觀的制約。對於敘事者而言，這樣的論述鞏固了自己在兩岸關係定位上的態度。以維護一個中國的原則來解釋北京退出紐西蘭的會議，完全符合關係論述的風格，敘事者不如此解釋的話，就使退出行動失去意義，則敘事者本人的態度也就值得商榷。但這種事後解釋，又完全無助於預測下次同一現象發生時，北京是否會採用同一種行動，因為情境與人物可能完全不同^⑮。比如，要是台北接受一國兩制的話，別說政務委員，就是行政院長去出席，說不定都變得可以接受。

有趣的是，華盛頓在看待北京時，就會對於統一作為一項政策目標有多急迫，有所質疑。華盛頓的策士會很仔細地分析，在一般國家都擔心的議題上，如經濟成長、區域安定、國內秩序等方面，北京有哪些必然的需要，再進一步觀察，當北京要滿足這些需要時，會對美國有多依賴，對和平的兩岸關係多渴望，然後判斷大陸會用多少剩下的精力來推動統一。他們當然假設北京領導人也會認知到自己的需要，衡量自己的實力，來制訂它自己的兩岸政策。同時華盛頓也要根據自己在經濟發展、區域安全等利益考量上，評估北京能不能有所幫助，或製造困擾，比如在核武擴散、市場開放等方面，華盛頓必須獲得北京的協助，否則單憑它自己的實力，未必足以維護自己的利益^⑯。

在兩岸互動中，華盛頓重視兩個關鍵因素，一是兩岸經貿關係是否制約著雙方的衝突行為，另一是兩岸的軍事實力是否足以彼此均衡。通常，華盛頓以提供台灣防衛性武器來維持均衡，使北京以武力進行統一的能力被削減，當然其間的前提是，北京的意願受到能力的限制。不論是北京或華盛頓的需要，或兩岸實力的對比，在華盛頓

註⑭ 例見黃嘉樹指台北要北京「未說統一卻先承認分裂的合理合法」，「只想製造和緩假象」，於「一九九六兩岸關係簡評」，輯於姜殿銘（編），*台灣一九九六*（北京：九州圖書出版社，一九九七年），頁三一～一五。

註⑮ 見 Chih-yu Shih, "How Flexible Is Chinese Foreign Policy," *Issues and Studies* 30, 12 (1994), pp. 44~68.

註⑯ 參見 John R. Faust and Judith F. Kornberg, *China in World Politics* (Boulder: Lynne Rienner, 1995); Andrew Nathan and Robert Ross, *The Great Wall and the Empty Fortress* (New York: W. W. Norton, 1997).



的論述中，都是一個相對的概念，不是一個絕對的立場陳述^⑰，因此只要問題不突出，就永遠不具備急迫性。而兩岸雙方的意願，既然是受到實力的制約，美方在推動自己政策的時候，就可以藉由改變（或威脅改變）雙方實力的對比來完成。華盛頓自比是一個客觀理性的政策制訂者，它也用這樣的前提去期待兩岸的決策單位^⑱。

儘管，人們對於北京、華盛頓、和台北的行為模式中，什麼因素或需要最具影響，並不見得相互同意，但起碼都認為他們應當共有一套行為模型，這個以物質利害、物質能力為基礎的分析與論述，當然是經由某種演繹關係建構起來的，其中每一個人物的行為都具有普遍共通之處。在華盛頓熟悉的論述裡，共通價值的表述就是自由主義。自由主義的分支何其多，但放在兩岸關係的分析中，只凸出地彰顯了資本主義、反共、民主、人權這樣的價值，則毫無爭議^⑲。所以認為大陸在市場改革與加入全球化潮流之後，當地人的行為就更可以預期，更符合模式所假定的普遍理性，對於兩岸關係的和平與穩定就更有幫助。當然，人們對於如何反共與民主化的看法南轅北轍，但這些爭議都能幫他們把共通的理性主義、與現實主義價值，更為強化。

當華盛頓在分析兩岸交流時，個別學者所依據的模式依彼等之選擇，可能是文明衝突論、和平演變論、中國威脅論等，每個模式都重視大陸的軍事發展、軍事實力^⑳。當一件事發生的時候，人們回到自己的模式思考，如何詮釋事件或修正模型，所以分析家的反應，必須先有一個認知篩檢的過程，不是自發的，每一個模式都必須在事前就已經預測到兩岸行為的傾向，否則事後就會面臨被拋棄的命運，對某次政策行為的理解，在下次類似行為發生時，一樣必須能說得過去。比如，中國威脅論期待北京對華盛頓的挑戰，則挑戰的發生與否必須準確地經由雙方實力的消長來預測。如此一來，北京的統一政策就不是立場問題，而是能力問題。

北京作為一個關係論述者十分明顯，當它聽到華盛頓以實力來理解統一問題的時候，自然有遭到否定的情感反應。北京必須瞭解華盛頓的意圖，但華盛頓的策士繁多，又得進一步觀察每個人過去的立場。許多人可能是因為誘於大陸的市場，而不願與中共的一個中國原則相忤逆，其他人則受制於不同的政治考量，而對北京大加批判。這些背後的因素，北京的分析家也許知道，但在論述之中都只能承認他們支持一個中國或反對的結論，而不能追究其原因，否則北京自己的一個中國，就變得也是一個利害

註^⑰ 此所以才會有所謂「中程協議」的提出，著眼於雙方各讓一步，由北京承諾不用武，台北承諾不獨立，見李侃如，「緩和主權爭議，發展長期兩岸政治架構」，*中國時報*，民國八十七年二月十九日，第九版。類似概念在白霖、何漢理、張戴佑等美籍學者或官員文章中都鼓吹過；另外參見 Joseph Nye, "China's Re-emergence and the Future of Asia-Pacific," *Survival* 39, 4 (Winter 1997~1998), pp. 65~79.

註^⑱ 參考 James R. Lilley and Chuck Downs, *Crisis in the Taiwan Strait* (Washington D. 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1997).

註^⑲ 參考 Nancy B. Tucker, "China-Taiwan: US Debates and Policy Choices," *Survival* 40, 4 (1998), pp. 150~167.

註^⑳ 例見 Samuel Huntington 關於中國的崛起與因南海爭議所導致衝突升高可能的分析於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6)；另可見 Richard Bernstein and Ross H. Munro, *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7).



問題了。在感謝同一陣線的人時，所給予的好處是在一個中國原則被確立的前提下提供的，不能理解成一種利益交換。對像季辛吉這樣的人而言，他在中國的利益讓他支持一個中國，在北京來看，只是給已經成為朋友的人一些好處而已。

北京八九民運中的決策或在九五、九六年的導彈試射，提醒了許多美國的知識界與政策界，北京還是不理性的^①。和平演變的模式在八九年天安門民運時遭到第一次的打擊，現在又變成了批評的對象。北京為了李登輝訪問母校康乃爾而大動干戈之事，是在表達對一個中國立場遭到破壞的強烈反彈，這使得華盛頓重新理解兩岸的需要，不但對北京的需要加大承認，也開始覺得要削減台北方面的實力。後者對於北京而言是一個正確的態度，所以北京和華盛頓就在兩種論述的調整下，先是華盛頓接受了一個中國立場，接著是北京與華盛頓進入了戰略夥伴關係。在北京的論述中，新關係的建立就算已經糾正了台北的錯誤；在華盛頓的論述中，新關係的建立事實上引領中共進入全球化潮流的現實世界。

四、台北的論述策略

台灣的論述風格無法用上述兩類來劃分，主要的原因是台灣在二次戰後的發展，已使此間政壇習慣的論述，同時具備了關係論述與現實論述的風格。在冷戰期間，台灣一方面接受以美國為主導的國際政治論述，強調實力與發展的分析方式^②，故對於實然面的論述有所熟悉，另一方面則繼續引用內戰的問題意識，以泱泱大國自居，極度重視名稱，且有漢賊不兩立的意志力表現^③。到了後冷戰時期，全球化潮流牽動兩岸關係，國內政治加速本土化，逐漸改變了內戰問題意識，取而代之的是走出歷史，擺脫悲情，追求國際承認的出頭意識。不過，關係論述的風格並未有明顯的轉變，在目前台北的兩岸論述中，仍並存著關係取向與現實取向兩種風格。

每當台北採用關係取向的論述，其問題意識就有以意志力為內涵的應然面，故眾所周知，李總統一再強調勇敢、不怕、堅定、戒急用忍的態度。台北大陸政策根本訴求，是北京應當承認台北對等實體的地位，同意台北加入國際主權體系。基本上這都是態度問題，而不是具體的政策，而反對黨也對態度問題一樣關注^④。而台北觀察北京態度的依據，就在於它對一個中國下如何安排兩岸外交關係：是不是允許雙重承認？台北可否參與聯合國？台北學界與政策界所研究的問題大量集中在中共對台灣的打壓

註① 這種認識，在學界一直存在，比如 Edward Friedman 相信唯有中國分裂，才有可能使中國人的民主化免於民族主義的干擾，見 *National Identity and Democratic Prospects in Socialist China* (Armonk: M. E. Sharpe, 1995)；又參見 Jonathan Unger (ed.), *Chinese Nationalism* (New York: M. E. Sharpe, 1996)。

註② 例見林碧炤，*國際政治與外交政策*（台北：五南書局，民國七十九年）；蔡政文，*當前國際理論發展及其評估*（台北：三民書局，民國七十八年）。

註③ 參見 Tai-chun Kuo and Ramon Myers, *Understanding Communist China: Communist China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6)。

註④ 例見民進黨關於台灣地位的決議，主要關切是如何詮釋台海現狀，而非具體的政策。參見「民進黨台灣前途決議文」，聯合報，民國八十八年五月九日，第四版。



上，與兩岸在各方面的對抗競爭上，而且絕對不信任中共在兩岸關係上有出現讓步的可能^⑤。經過多年來關於外交上的零和對立，台北政學界逐漸歸納出了對北京立即的負面評價，批判往往是自發的，不必經過冗長的認知比對過程。所有敘事者都注意到此岸最敏感的尊嚴問題，是這個情感需求在抗拒一個中國的立場。

同時，台北也從事著實然面的兩岸論述，讓北京不能與台北針鋒相對，這時台北不再是圍繞在一個中國的定義上打轉，而是綜論大陸整體的發展與台灣的角色^⑥。由於大陸在現實論述中是個分析對象，則大陸變得必須被動地因應有關敵意、專制等方面的分析，故在關係論述中爭取出頭與尊嚴而不可得的情況下，現實論述有助於台北避免尊嚴的追求受到直接的挫折，甚至還可以因為取得了主動選擇議題的地位，反而變得比大陸還先進。現實分析如果能配合美國時，對台灣更有利，使台北更覺得不必再受北京打壓，但倘若與美國不能配合，比如當我們用中國威脅為分析角度時，若碰到美國以和平演變為分析角度的話，對於尊嚴的提升就失去效果，但這時台北與華盛頓的歧異不在於論述風格的不同，而在於分析模型不同。

北京對於台北採用現實風格的論述勢必感到沮喪或不安，其程度且超過當北京在與華盛頓辯論時的不安。北京並不期待華盛頓能理解一個中國的態度問題，而多次以華盛頓眼中不能諒解的方式來表現此一態度，雖然在美國關於中國威脅的論述下，北京也很不安，但如台北也開始援用之，這就更加剝奪兩岸之間的溝通的契機。北京期待台北留在關係論述中，才好有一個辯論對象，所以當台北也開始打民主牌，也開始以軍力分析和國家安全為問題意識時^⑦，北京就沒有辦法直接表達自己反台獨的態度，則在認知上造成的落差更大，引起情感上的不安更深廣。從這一點看，台北的論述風格雖能獲得調整，並迴避美國接受一個中國的帶來的壓力，卻又未必絕對有利。

台北所採用的具有現實風格的兩岸論述，也側重跨時空的普遍需要如安全、和平、發展等方面。在這一套論述中，大陸對統一的堅持變成表面的泡沫，對台政策不再是態度問題，人們對於兩岸實力的對比認真分析，將實力的差距直接與威脅的大小聯繫起來。在看待大陸時則將之對象化：關心彼岸經濟發展的速度（所以就想引誘台資？）^⑧；民主化的進程（所以會怕台灣民主？）^⑨；派系的分合與折衝（所以才對台強

註⑤ 有關這方面的論述，散見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所編大陸工作參考資料第壹冊（民國八十七年）的各章，如指中共「霸道」而台灣「有善意」，頁六二二，或中共「一再的無理舉措」，頁六四二，「蓄意打壓」，頁六七九，設下「政治陷阱」，頁七三〇，等等，不另贅引。

註⑥ 例見趙建民，兩岸互動與外交競逐（台北：永業出版社，民國八十三年）；又如包宗和、吳玉山合編，爭辯中的兩岸關係理論（台北：五南出版社，民國八十七年），宣稱要使兩岸關係成為理論研究，而非停留在新聞話題或政策焦點的境界。

註⑦ 例見林中斌，核霸（台北：台灣學生，民國八十八年）；徐博生，「中華民國國家安全戰略」，理論與政策十，一（民國八十四年十二月），頁三～二五。

註⑧ 例見陳德昇關於中共運用經濟實惠、統戰策略與政治手段來吸引台資於，兩岸政經互動——政策解讀與運作分析（台北：永業出版社，民國八十三年），頁七五～八七。

註⑨ 例見趙建民提醒讀者注意鄧小平說的，即把民運與台灣「相勾結」，並反對台灣的資產階級自由化，見當代中共政治分析（台北：五南出版社，民國八十六年），頁二一九～二四一，關於政治反對；另外，他也認為台灣經驗是大陸民主化的參考，見關於政治民主化的分析，頁二八五。



硬？)⑩；並引用西方關於中國威脅、和平演變、文明衝突等理論模型。根據中共的威脅潛力可以假設敵意的存在，再依照這個可能的敵意來分析此岸如何因應⑪，其中包括軍事武器的採購，爭取美國與日本在安全上的承諾，與盡量分散對大陸的經貿投資等，目的是增加中共武力犯台時的成本，並試圖降低台灣對大陸的經濟依賴。和關係取向的論述相比的話，現實風格的論述適合用於台灣以外的場合，即當人們假設聽眾是大陸或國際時，採用現實風格的論述較易溝通，而在當聽眾是大陸或台灣之內的人時，論述風格則採用關係取向。即對外重視實然的分析，對內強調應然的態度。這個內外有別的論述空間，可以表示如下。

表二 兩岸關係中台灣的兩種論述風格

論述指標 \ 台灣的論述	關係論述	現實論述
問題意識	不否定台北為主權實體	和平、安全、發展的需求
論述對象	中華民國在台灣	軍力、派系、政治穩定
論述功能	推銷分裂分治	分析形勢
論述方法	不怕中共，生命共同體	文明衝突、中國威脅、和平演變
論述速度	相對迅速	相對費時
參考依據	互不信任	國際政治
論述動機	尊嚴、出頭	衝突、競賽
時間位置	台灣有沒有比過去更獨立	大陸終將民主化、市場化
空間位置	國內，兩岸之間	國際間

台灣存在兩種論述風格，使北京和華盛頓在與台北對話時的解讀，就變得愈來愈複雜。當北京在聽台北的應然面論述時，與北京的看法與立場可以說是針鋒相對，這兩種立場彼此可以完全溝通，但不是因為雙方態度一致，而是因為論述的風格一致。台灣的優勢在於有選擇的餘地，也就是可以發展出一套論述的策略，因應不同的聽眾。在兩岸之間，台灣事實上是兩套論述風格並重的。在現實論述方面，常見的是對於大陸軍力的分析，敵意的前提，和民主化的預期⑫；而在關係論述方面更普遍，如海基

註⑩ 例見吳玉山、林文程、江水平有關改革與派系政治分析，後共時期對大陸及台灣的震盪（台北：財團法人國家發展研究文教基金會，民國八十四年）；又如楊開煌關於軍方介入兩岸關係的時段性與事件性的討論於，「中共軍方在對台政策中的角色分析」，輯於展望公元二千年兩岸軍力平衡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空軍軍官學校，民國八十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註⑪ 例見林正義，林文程關於大陸政策目標是延緩台海危機，以降低經貿依賴，制訂模糊核戰略，維持局部優勢，尋求同盟，來因應國家安全的最大威脅，即中共，於「論我國二十一世紀的國家戰略」，輯於展望公元二千年兩岸軍力平衡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空軍軍官學校，民國八十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張旭成、沙特拉合編，如果中共跨過台灣海峽：國際間將作何反應（台北：允晨出版社，民國八十四年）。

註⑫ 例見張建邦、林中斌，二〇一〇中共軍力評估（台北：麥田出版社，民國八十七年）。

會一向從負面解釋海協會的立場，開會時幾次提及中華民國，九二年後並明確反對在一個中國的文字下簽字。當台北轉身變為一個現實論述下的分析家時，北京必須就台北所分析的現象一起參與討論，雙方才有對話的意義。

台北進入現實風格的論述中除了是有冷戰經驗和美國的影響之外，也有刻意選擇的性質在內。這是因為應然層面的僵持不下，雖然口角雙方在言詞上並無輸贏，甚至可以說台北提出多個關於一個中國的詮釋後，反而略有斬獲，也就是在兩個政治實體、一國兩府、兩個中國、一個分治的中國、中華民國在台灣、以一個中國為指標的現階段兩個中國、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特殊國與國關係等抗拒一個中國的論述中，使得北京對於一個中國的堅持模糊了^③，但因為始終不為北京所認可，所以並未取得真正的勝利。九六年之後華盛頓介入兩岸，並率先接受一個中國原則，使得兩岸之間的口角開始不利於台北，這是台北迴避關係論述，改採現實論述的重要背景。

對北京而言，台北所用的現實論述中講的雖然是民主、軍力，但背後一定隱藏了應然面的態度，故國家安全的說法就意味著鞏固分裂現狀，民主牌的使用更代表台北拒絕統一的態度。這些來自北京的指控，美國人未必能從情感中體會，儘管言詞上可以聽懂。相形之下，台北因為自己也熟稔關係論述，就完全能瞭解北京的感受。相對於北京可以點出台北的實然論述背後隱藏的應然態度，台北的現實分析家也一樣能指出應然論述背後隱藏的實然分析。比如，台北就明確指出一個中國是反民主化的，因為這個原則預設了中國不會和平演變^④。中國會不會和平演變不是北京會去問的問題，在被問到的時候，答案也只是一個態度，不是分析。無論如何，台北變換論述的能力，將北京的不安複雜化，則不安勢必加深。除非北京能更快速地內化實然論述，不然兩岸因為論述風格差異而帶來在態度上的不滿，遲早會演成衝突。

自從特殊國與國關係提出後，北京當然是將之放在關係論述中理解，因此憤於台北在立場上完全背離一個中國的政策。台北宣稱自己講的是事實，但又澄清說此一事實不改變自己追求統一的立場。其實，台北是在轉移論述策略，用現實論述來包裝關係論述。嚴格說，特殊國與國關係不是現實論述，因為國與國關係的說法本身，不是行為，而是主張，只有宣傳國與國關係才是行為。而現實論述要解釋的，是此一宣傳的行為反映了什麼理性，此所以美國方面普遍要問，為什麼選在此刻宣佈，有什麼好處，而台北則斷然否認有什麼利益或政治考量，只是要把話說清楚，好有個與北京談判的定位。

每當台北的中國威脅論和華盛頓的和平演變論出現不一致時，許多台北策士改用關係論述，強調台灣人的尊嚴與主體，不斷地質詢華盛頓最細微末節的遣辭用字，擔心自己被出賣。當華盛頓方面將這種反應看成是不理性的，超乎實際的時候，台北其他的政治人物也能懂得，即華盛頓點出了這些關係論述背後間接預設的實然分析，比

註③ 見張五岳，「柯江會談對兩岸關係之影響」，理論與政策十二，一（民國八十七年二月），頁四一～五一。

註④ 見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張主任委員京育在第五屆國家統一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專題報告，報告以駁斥一個中國，強調分治為前半的重點，以分治邁向民主為結尾，見「一年來兩岸關係的回顧與前瞻」，影印本。



如台灣可以加入聯合國或公投獨立的環境並不存在。但若反過來，由台北點出華盛頓的和平演變和國際政治分析背後，隱含著對中共的信任，對台灣尊嚴的壓抑，或台灣應該在有些時候怕北京時，只採現實論述的華盛頓策士儘管可以聽得懂，但不見得能感到同情。

五、論述風格與認知衝突：代結論

在兩種論述之中往來跳躍的能力，並不是可以輕易習得，尤其當我們已經進入了某一種論述風格之後，更難在認知上體會到另一種風格所從出的問題意識。以鄭、趙兩位教授的例子可以看出來，當敘事者進入當事人情境開始堅守一項原則時，自己就是當事人，對於態度的掌握很準確，碰到決策情境時也就能自發的反應。像所謂漸進主義的說法，只要讀者自己本人也接受它為一項主張，就可以迅速地體會中共領導人在面臨政治改革時的心態。他們不能受烏托邦的引誘而走激進路線，也不可以基於一己之私而遲滯改革，所以漸進是他們的態度，根據這個態度，他們可以在對事件狀況完全掌握之前，就先訂出決策的原則，只是具體狀況怎麼處理，在碰到之前誰也說不準。

漸進主義與類似的提法，包括新權威主義、新保守主義、鄧小平的貓論、基層政權的民主管理、文化大革命等等左右光譜上的立場，都是一個態度問題。當人們用態度問題解釋一切的時候，現實論述下再好的分析家都無法與之溝通，反而引起質疑，為什麼要用理論、模型、邏輯來迴避自己的責任？是不是因為在態度上站不穩，所以才要躲在分析架構的後面？在兩岸關係當中，北京的政、學界一貫以關係論述來鋪陳他們對台北的認識，故人們最先看（甚至只看）台北來客在統獨上的立場，替他們在統獨光譜上定了性之後，對他們爾後言論舉止的意義詮釋，幾乎就是自發性的了，而每一次的詮釋和反應都鞏固強化了敘事者本人的態度，使得自己更難耐心聽取現實論述的分析。

台北在兩岸關係之中大量地強調軍力平衡、民主化、國家安全、分治現實、主權能力等觀念，北京雖然有所聽聞，但在它的關係論述中沒有相應的語言能處理這些概念，只好強調自己在態度上不會針對台灣同胞^⑤。它對台的論述並未像對美的論述那樣，曾試圖從現實論述的語言來翻譯自己的立場，好處是讓華盛頓認識到，北京看似不理性的一面，有其理性的限制，從而願意配合北京，在政策上調整對台關係，更加地傾向一個中國的立場。壞處則是使自己原本堅持的所謂原則問題，變成了一個可以計算利害的現實問題。北京在對台的論述上大體堅持只用關係論述，一直到近來台北試圖與華盛頓在現實論述上趨同之後，才也開始以外交和軍事上的能力，以及兩岸相互需要的現實來與台北溝通。如此，兩岸在論述上的衝突，可以分成三塊：在關係論

註⑤ 見江澤民新春對台發表的八點談話所謂「中國人不打中國人」，一九九五年一月三十日，影印本；另見中共中央台辦就和平統一的談話，謂「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這絕不是針對台灣人民」，一九九一年六月七日，影印本。



述中統與獨的衝突；在現實論述中能力、價值等方面的衝突；論述風格差異引起的衝突。

最後，是關於方法學上的問題，亦即能否有效判定一項論述是屬於哪一種風格？與在不同論述風格之間移轉的自由度多大？本文是依照鄭、趙兩位教授在實際對話中所遭遇的溝通困境，歸納出兩種風格，繼而在將兩岸關係的各種流行的觀念，依照表一加以歸類成表二，未來更有系統的研究可以有兩個方向，一是檢證屬於同一種論述風格說法，其同時出現的頻率，是否遠高於分屬不同風格的說法同時出現的頻率；二是將同時出現頻率高的說法與同時出現頻率低的說法分門別類，看是否符合關係論述與現實論述的分類。如果得出系統，便進一步觀察論述風格與敘事者身份地位場合之間的相關性。

過去認為兩岸在認知上有衝突，指的是同一類論述風格之內的衝突。本文則認為，因為論述風格不同所引起在認知上的衝突，其在情感上所造成的不安，未必亞於統與獨之間的衝突。台北的優勢是可以熟練地轉移論述的風格，這在短期內有助於分散因為關係論述中的尖銳對立所引起的衝突，但長期下來因而累積了在北京方面的極度不安。此時台北的優勢就可能轉變成負債，因為在台北，人們不理解為什麼大陸的人不能在論述風格上像台北一樣有彈性，這種不理解，使北京更難釋懷，為什麼台北可以週期地放下在應然或態度問題上的討論，突然變成一個分析家對大陸指指點點？這樣看來，台北從鄭永年與趙全勝兩位教授的身上，可以學到的並不是什麼科學的定律，而是論述風格不同帶來的誤會。

* * *



Discursive Styles and Strategies in Beijing-Taipei Exchanges

Chih-yu Shih

Abstract

There have been two discursive styles existing in the cross-Taiwan Strait relationship: relational and realistic. The former is concerned with attitude, norm, and policy promotion and is spacio-temporally specific, while the latter is related to analysis, theory and behavioral prediction and is universal. Washington typically displays a realistic style in its statements and Beijing, a relational style. Taipei adopts both, using them alternatively. This paper argues that differences in discursive style may cause more anxiety than disputes within the same style.

Keywords : cross-Taiwan Strait relations, discursive analysis, China policy, Taiwan policy, epistemology, China studies

